



On the Primitive Image and Root Seeking Consciousness in Root Seeking Novels

Jinhui Zhao

School of Liberal Edu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Dalian, China

Email address:

740134649@qq.com

To cite this article:

Jinhui Zhao. On the Primitive Image and Root Seeking Consciousness in Root Seeking Novels. *Science Innovation*.

Vol. 10, No. 3, 2022, pp. 61-64. doi: 10.11648/j.si.20221003.11

Received: March 14, 2022; Accepted: May 12, 2022; Published: June 1, 2022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root seeking literature is an influential literary movement in the mid-1980s, but the literary circles have always had different views on root seeking literature. There is no unified concept about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root seeking, such as "root", "culture", "tradition" and "fracture", which makes the root seeking novels have "many semantic fields" and the tendency of variou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especially the differences on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very obviou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ot seeking novel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so as to deeply grasp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root seeking novel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traditional expression of root seeking writers is based on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contemporary humanistic environment, and conceives the original natural picture of all things with the help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howing the worship and admiration of the original nature, the direction of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nd the romantic concept of survival and primitive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he "primitive image" proposed by Zhao Peilin in the origin of Xing,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ains the spiritual and mysterious image codes in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root seeking novels *White Deer Plain*, *tree king* and *northern river*, and probes in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s and root seeking consciousness transmitted by the three primitive images of "deer", "tree" and "River".

Keywords: Root Seeking Novel, Primitive Image, Root Seeking Consciousness

试析寻根小说中的原始兴象与寻根意识

赵瑾慧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通识教育学院, 大连, 中国

邮箱

740134649@qq.com

摘要: 寻根文学思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场影响极大的文学运动, 但文学界一直对寻根文学的看法褒贬不一。有关寻根的理论概念诸如“根”“文化”“传统”“断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 这使得寻根小说出现了“众多的语义场”以及各种文化阐释的倾向, 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分歧十分明显。因此, 要厘清寻根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尤为关键, 由此需要深入地把握寻根小说的文化涵义。值得注意的是, 寻根作家的传统表达是建立在与当代人文环境相联结的基础之上, 并借助传统文化构思出万物有灵的原始自然图景, 表现出对原始自然的崇拜与赞叹、对自由脱俗与独立精神的向往, 具有浪漫主义的生存观念与原始意识。本文以赵沛霖在《兴的源起》中提出的“原始兴象”作为理论依据, 具体分析阐释寻根小说代表作《白鹿原》《树王》《北方的河》中灵性神秘的意象符码, 探析“鹿”“树”“河”三种原始兴象所传递的传统文化观念与寻根意识。

关键词：寻根小说，原始兴象，寻根意识

1. 引言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复兴现实主义文学到深入民族历史文化的历程，不断地超越政治、经济束缚，进入文化层面。寻根小说试图复苏传统审美意识，将“根”作为自己的创作源泉，在传统文化中追寻新的价值判断，企图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的文学。在摆脱过去长期机械工具论的创作方法以及西方文学的强烈影响下，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者纷纷投入“民间”创作。作家们追溯民族精神与文化内涵的途径和方法不仅指向了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还有意识地加入了地域风貌、民间风尚、习俗、故事传说等地方文化因子。在寻根的创作中，贾平凹以沉着冷静的口吻，讲述神秘质朴的“商周”故事。汪曾祺通过充满诗意的笔触，描绘着散发泥土气息的高邮乡村。还有李杭育具有浓郁吴越文化氛围的“葛川江系列”，都在向读者们讲述一段段古老、神秘的民间故事，这也是寻根作家不断探索中国民族文化的佐证。除此之外，寻根作家在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韩少功凭借《文学的“根”》发表寻根宣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1]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是在理论宣言方面，寻根作家对民族文学有着十分强烈的表达欲、探索欲。

在寻根作家不断探寻“文学”到“文化”的进程中出现了许多超自然观念的意象，这些意象多与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祥瑞观念相联系，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蕴意。这种复合着原始宗教观念与民族文化表现的意象，称之为原始“兴象”。“兴”是在原始社会意识形态长期发展中自然物象与宗教观念内容结合，由习惯性联想再到一般的规范化的艺术形式。[2]兴象渊源于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生活，当兴象与小说中所虚构的故事结合时，便可以负载民族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这也是小说对文化继承的一种方式。

兴象和传统意象在内涵上有所区别。传统意象的“意”是人的主观情感，“象”是客观物象，也就是说传统意象是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的结合。通常是作者对外界事物心有所感，为其寄托给一个选定的具象，使作者的情思与物象融合，形成一个特定的艺术天地与想象空间。例如元代词人马致远《秋思》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都是诗人所选中的意象，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与作者凄清、伤感的心境融为一体。而兴象则是“一个历史的范畴”[3]，赵沛霖在《兴：宗教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的积淀》一文中描述了兴的起源：“兴起源过程的第一步，是自然物象的超现实的观念内容的产生。自然物象被赋予一定的观念内容，这个本来与艺术不相干的事实，对于后来兴乃至艺术的发展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在事实上构成了原始兴象产生的基础。”[4]同时也提出了“兴”的形式中“凝聚着传统的观念内容和社会意识，对于这个形式的感受中凝聚着超感观的理性内容”[2]。可以说，“兴象”不仅是物与情感的结合，更是负载了原始神力和情感关系的抒情符

号。从功能上讲，兴象扩大了“意”与“象”的表现范围，使意象与原始文化、民族信仰相联系。

沿着“兴象”诗学理论的思路，本文选取了三部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分别是陈忠实的《白鹿原》、阿城“三王”之一的《树王》、张承志《北方的河》为例，着重分析小说中原始兴象的文化涵义以及兴象与文本的关系。

2. 寻根小说中的原始兴象与文化观念

寻根文学的序曲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许多作家接起了五四以后沈从文、废名、萧红一脉，从乡土文学传统中汲取养分，表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与民族情感特征。少数民族作家乌热尔图、回族作家张承志、陕西作家贾平凹等众多寻根作家都渴望在现实的激变中寻找回归自然母体的精神通道[5]。作为巩固自我的艺术行为，寻根作家并没有沿着以往充满批判的乡间挽歌式书写，而是选择在乡土文化中开掘原始的民间魅力。作家们贴近乡土，并赋予自然界以超现实的观念内容，在众多的寻根故事里探讨了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之间的存在关系。例如，乌热尔图《七叉犄角的公鹿》叙述了男孩与“鹿”的奇遇；何立伟《白色鸟》展现质朴恬淡的生存景观；贾平凹《怀念狼》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在“鹿”、“鸟”、“树”等自然的原始意象中蕴藏着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对人物、事件发展的重大影响，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文化做出阐释。

2.1. “鹿”：仁义理想

“鹿”常常和儒家文化密切相联。鹿的体型优雅又十分恬静，这与儒家文化的思想道德准则相一致。在古代文论里“鹿”与“仁”总是相伴出现，例如陆贾在《新语·道基篇》言：“《鹿鸣》以仁求其群。”[6]《诗经》中关于“鹿”的表述为：“鹿得萍，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君乐宾客，当有诚恳相招呼以成礼也。”[7]佛教经书也以“鹿”作为主人公之一，其中《佛说鹿母经》和《佛说九色鹿经》讲述的便是鹿与诚信道义的故事。可见，“鹿”常常同儒家文化中仁、礼、德结合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鹿是“仁义礼智信”的化身。

在《白鹿原》中，神“鹿”作为祥瑞文化的符号，总与宏大的历史传奇融合在一起。“鹿”天生长寿的属性可以反映出历史的浩瀚，正如《述异记》所言：“鹿一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化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8]。因此，白鹿作为百年历史的见证者，在小说中常常扮演着神秘精灵的角色。白鹿精灵在梦中时而出现在又时而消失，神秘莫测。据说《白鹿原》的创作灵感出自于蓝田等地方县志与《太平寰宇记》等历史文献，其中记载：“平王东迁时，有白鹿游于此原”[9]，这里“鹿”作为古老故事叙事的象征物是历史文化积淀的载体。小说中的“白鹿书院”不仅是《白鹿原》的重要地标，也是小说通往“寻根”历史文化的窗口。白鹿书院的前身是“四目庵”祠堂，这一祠堂的建

造与“鹿”有关。在宋朝年间,一位河南的地方小吏路过白鹿原,眼前突然有小鹿凌空一跃,小吏仿佛受到了某种感召,便迁居于此。在神鹿的庇佑下,小吏的孙子们不仅连出四位进士,其中一位官至左丞相更是与司马光文彦博齐名。在小说中,“鹿”作为保护神,牵引着各类人物的命运,将过去的故事融入当下的情节发展,使文本处处充满着神话色彩。同时,作者在叙述上也有意增添民间风味,采用倒叙的手法回忆白鹿传说,将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割裂,也为小说营造了神秘氛围。

“鹿”与“禄”谐音双关,所以“鹿”意象还具有祥瑞兴旺之意,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小说中凡是白鹿所过之处,皆万木繁荣,五谷丰登,一切都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四进士接连高升,也是祥瑞征兆的表现。此外,“鹿”的灵验之处还体现在人物关系上,小说中众多人物都与“白鹿”产生了各种羁绊:无论是“白鹿”化身朱先生,还是得到“白鹿”天启的白嘉轩、被“白鹿”寄予美好祝愿的白灵,其命运的始终皆与“白鹿”相关。具有神秘力量的“白鹿”不仅使人物、环境与天命结合,同时也是作者文化反思的窗口,通过朱先生、白灵的相继逝世,白嘉轩所坚持的传统精神走向消亡,折射出作者对儒家文化的复杂态度。

“白鹿”作为保护神具有趋利避害、祥瑞长寿的功能,这与传统的图腾文化有着密切联系,通过对客观物象的寄托反映出原始初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意象与原始宗教文化融合产生具有兴象意味的“神鹿”,继而揭示稳定的民族观念。“鹿”还蕴含着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思考,既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也有对传统“仁义”观念的反思。

2.2. “树”: 故里之根

中华民族作为农耕民族,与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土地作为人们重要的生产资料,常常通过政治、经济、权力、血缘来维系宗族的稳定。为了维护宗族秩序,土地作为人们祭祀供奉的对象,继而产生了“土地神”。按照民间的习俗,每到播种或收获的季节,农民们都要立社祭祀,祈求或酬报土地神。“土地神”用来寄托人们祛邪、避灾、祈福的美好愿望。在《礼记·郊特牲》中记载:“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乡与北牖,答阴之义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10]可以说,社祭是祭祀土地神,“神地之道”是土地崇拜的表现。因此,“土地”意象具有原始的宗教意味同时又负载着家国文化涵义。

“树”与“土地”是枝与叶的共生关系,因此,“树”也累积了宗教意味。在作品《树王》中,“树”有着人一般的生命体征,它“嫩绿的汁液与光下眼睛似斑驳的光影,使人们发怔。”[11]关于“树”的描写,作者运用“蜷起”“静着”“咳嗽”等动词,有意呈现出人化自然的状态。当人们走向树王时表现出好奇和胆怯,甚至不敢近前担心树王能使天塌地陷,这体现出人对自然本能的敬畏感。费尔巴哈认为:“对于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成一种任意作为的有人格的实体的想法,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基本行为的基础。”[12]因此,在石木文化的影响之下,

人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这种叙事方式既是受到传统社祭文化的影响,也是寻根作家对传统自然观的认同。

中国古代哲学中认为天能影响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尚书·洪范》中有言:“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暘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13]意思是说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风调雨顺则国泰民安。小说中的“树王”的神秘灵力与古代儒学中的“天人感应”思想不谋而合。当人们违反自然伦理,就会遇到无法预料的灾祸。在小说中描写烧山场景:山火发出了各种怪叫,麝子反常地奔向燃烧的大火,主人公肖疙瘩猝然离世……这都是破坏自然生态的结果。

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也就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是合一的。因此,“树”的原始神力包涵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谐”、“向善”、“守则”的自然之道。此外,在小说中,为了体现“合一”思想,作者还巧妙的将对立的意象进行融合转化。文中“树”和“刀”是一组矛盾对立的意象,但当树被刀砍下后,树的精魂与肖疙瘩融为一体,转生为一朵“白花”且能治愈刀伤。可以说,从“死亡”到“新生”,使树王的意志得到了新的继承,在“天道”和“人道”中完成了统一。

“树”的神秘灵性来源于祭祀文化观念与天人感应学说,人们对“树王”的敬畏体现了原始宗教观念对现代人的影响。“树”是家园文化的象征,“树王”的存在与毁灭反映出新旧时代交替中价值取向的变化,并通过以德报怨、有容乃大的传统文化品格否定了更为激进的现代观念。很显然,作者对“树王”的想象与建构,隐伏着知青一代对其生命之“根”的追溯,这也显示出寻根作家在新旧观念更迭中对文化传承思考。

2.3. “河”: 民族强力

每一个民族的繁衍,每一种文化的滋生,都是河流滋养哺育的结果。河流的不舍昼夜,象征着民族的发展从一个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从一条大河流向另一条大河。《北方的河》是关于追忆与寻找的故事,作者以诗化的笔调讲述了知青男青年为了报考“人文地理科学”的研究生而踏上了关于“河”的考察之路。

小说并没有通过各种充满奇幻色彩的传奇故事来书写河流,而是深入到现实世界中去关注知青一代的自我成长问题。寻根的记忆总是伴随着知青的记忆,小说延续了张承志一贯的抒情笔调,选定“北方的河”作为抒情客体,突出了北方的地理风格与文化气质。丹纳认为,决定文学的三大要素分别是地理环境、种族和时代,强调文学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14]可以说,河流文化与某一地区的生活习惯、民风民俗息息相关。因此,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北方所特有的原始强力与坚韧的品格。虽然小说并没有过多的叙写传奇,但是与人物性情相照应的“大河”仍然具有非客观物象的灵性。作者通过浪漫并富有艺术张力的语言,描绘了“他”与河之间的心灵默契。小说中的河流不只是身外的、异己的自然物,它充满着灵性,善于启示,是主人公对话、交心的生

命体。“他”曾两次横渡黄河，黄河就如同父亲一般的存在，他对黄河的崇拜更是一种情感的皈依。永定河的耐心与韧性，能够使“他”逐渐沉淀下来，中和了过分的浪漫和冲动。当“他”完成与黑龙江的对话后，青春的褪色使他完成了蜕变。“河”作为父亲、母亲、朋友……陪伴着他完成了一次次对自我的重建。可以说，河流的灵性书写为小说增添了更多的审美想象空间。

北方的大河具有刚劲与柔美的特性。黄河、湟水、额尔齐斯河、永定河和黑龙江都是北方的大河，具有力量与野性的美。在小说中，黄河呈现出民族原始的生命强力，如同北方大地燃烧的烈火，将崇山峻岭染红。燃烧的黄河是万物复苏、充满活力的代名词，更是体现了古代文人百折不挠、执着进取的精神气质。河流的品行也会映射在人物身上，正所谓“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15]“他”在浩瀚的科学事业上不断迸发的活力和激情充分显示了“他”的志向与追求。

湟水与永定河虽然没有给人动人心魄的心灵冲击，但用内敛且含蓄的方式诉说历史的变化。古老的湟水是无声历史的索引，藏有独特的方言俚语和民歌，具有四千多年历史的彩陶罐充满着人世的沧桑。古色古香的永定河宛如传统审美下的温婉女子，既可以将山脉劈出深峡的长谷，同时又能保持着沉静、含蓄、宽容的品格。在刚柔并济下，“河”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刚柔与动静、有为与无为等一系列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文化思想，有着深邃的辩证精神。

3. 结论

中华民族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鹿”、“树”、“河”基本完成了从民族形式中提炼文化特质的过程。从客观存在的物象再到宗教观念与客观物象的交合，不断地转化为感性且充满着原始意味的“兴象”，使意象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蕴意。《白鹿原》中“鹿”以天启的方式，对传统文化中仁义观辩证思考。《树王》则是对文化更替的质询。《北方的河》展示了北方文化的大气澎湃，在沉静与强力之间折射出刚柔并济的民族智慧。

寻根小说中原始兴象的文化意义说明了寻根文学并非舶来品。寻根作家的是受到西方文学，特别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但并不意味着寻根文学是对外来文学的“仿制”或“临摹”。在新时期恢复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作家们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也体现在他们深厚的艺术修养之中，例如张承志有着深厚西北少数民族的功底，阿城具有古代美学与哲学的修养，韩少功积累了大量的苗族历史文献，李杭育深耕于浙江民间文艺的研究……可以说，正是作家的文化自觉与丰富的知识储

备，才能通过原始兴象连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对古代文学作品、古代宗教、哲学、历史文献重新认识与阐述。这充分显示了作家们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和对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开掘，从而实现了当代文学对文学观念、创作路径、审美意识的一次飞跃。

参考文献

- [1] 谢尚发.《寻根文学研究资料》[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8：77。
- [2] 赵沛霖.兴：宗教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的积淀[J].天津社会科学,1985(05)：第71页。
- [3] 赵沛霖：《兴的源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 [4] 赵沛霖.兴：宗教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的积淀[J].天津社会科学,1985(05)：第68页。
- [5] 谢尚发.寻根文学研究资料[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8：第264页。
- [6] 王利器撰.《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5页。
- [7] 王秀梅译著.《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6，第211页。
- [8] 任昉.《述异记世说新语》[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第111页。
- [9] 曹成竹.从《白鹿原》中“白鹿”意象看儒家文化的审美表征[J].百家评论, 2020 (01): 101。
- [10] 胡平生、张萌译著.《礼记》（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487页。
- [11] 阿城.《阿城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第69页。
- [12] [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60页。
- [13] 曾运乾，黄曙辉校点.《尚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22页。
- [14] [法]丹纳，傅雷译.《艺术哲学》[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 [1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34页。